

华侨研究所科学论文选集

华侨研究所编

暨南大学

PDG

目 录

华 侨 历 史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朱杰勤(1) 十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朱杰勤(18) 十七——十九世纪的越南南方华侨……………徐善福(34) 刘士木与华侨事业和南洋研究……………罗晃潮(44) 美国华工与中央太平洋铁路……………杨国标(48) 早期美国华侨的会馆组织……………刘汉标(58) 华侨与保皇会初探……………周聿峨(64)
华 侨 经 济	菲律宾华侨在西班牙统治后期的经济活动及其作用 (1778——1898)……………何思兵(71) 马来亚独立前的华人橡胶种植业……………张应龙(86)
华 侨 教 育	解放思想, 开创华侨教育新局面……………张泉林(104) 爱国爱乡 捐资兴学 ——佛山地区华侨办学调查报告……………张泉林、余以平、张兴汉、张唐生(110) 朝鲜华侨教育初探……………余以平(121)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杨国标(135) 陈嘉庚兴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张兴汉(146)

Content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 and Their Pligh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Zhu Jieqin (1)
Chinese Contract Labor in Indonesia in Mid-19th Century	Zhu Jieqin (18)
The Chinese in Cochinchina during 17th- 19th Centuries.....	Xu Shanfu (34)
Liu Shimu and the Enterprise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Luo Huangchao (44)
Chinese Labor and the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in U.S.A.	Yang Guobiao (48)
The Early Phase of the US-based Overseas Chinese Guilds	Liu Hanbiao (58)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ociety to Preserve the Emperor	Zhou Yu-e (64)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e Late Spanish Regime, 1778-1898	He Sibing (71)
The Chinese Rubber Planting Industry in Pre- Independence Malaya.....	Zhang Yinglong (86)
Emancipate Our Mind to Open up a New Prospect for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Zhang Quanlin (104)
Love of the Homeland Donation for Education.....	Zhang Quanlin Yu Yiping Zhang Xinghan Zhang Tangsheng (11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duc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Korea.....	Yu Yiping (121)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Yang Guobiao (135)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r. Tan Kah Kee' s Thinking on Initiating Education.....	Zhang Xinghan (146)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 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

朱杰勤

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是美国华侨史的一部分，也是中美关系在历史上一件重要事项。它根据中外公私文献，论述十九世纪后期大批中国人远渡重洋，与当地居民一道建设美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事迹，以及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又受到虐待和排挤的经过。这么一桩历史事件的出现，自然有它的时代背景、社会原因和其他主客观因素，问题不是简单的。欧美学者对这个问题曾经发表过不少专门书籍和论文，也提供过不少参考资料，甚至有时还作出一些客观的评述。可是，由于阶级利益和种族观念的不同，他们的看法和立论就很难同我们一致了。

我们认为，只有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结论。这个问题，在中美关系史上，在美国华侨史或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都应该抛弃偏见和成见，求得合理的解决。本文力图从历史科学角度出发，剖析这个问题，并且用历史事实说明，华侨是爱好和平的劳动人民，对居住国的社会建设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都曾经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大批流入美国及其原因

中国人何时流入美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班克洛夫特（Bancroft）说，一五七一至一七四八年间，已有华人在加利福尼亚造船。密阿尼（Meany）说，一七八八年美国遥远的西部已有华工。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萧（Samuel Shaw，有译作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十八世纪后期，新英格兰有华人流寓。又另一记载说，一八一九年波士顿有一个华人住了二或三年，并有几个华人在那里读书，据美国官方不完全的统计，一八三〇年有中国人三名，一八四〇年有八名，至一八五〇年有七五八名之多。十年之间人数增加将近百倍〔1〕。一八六〇年中国人在美国有三四，九三三名，到一八七〇年就有六二，七三六名〔2〕，即十年之间增加二七、八〇三名。为什么那个时期有大批中国人流入美国？我初步认为有下列原因：

第一，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使美国由殖民地获得独立，在政治上摆脱了英国的束缚，在经济上也解除了限制美国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八四六至一八四八年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攫取了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地。侵

墨西哥战争结束后，美国资产阶级开发西部土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八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流域（Sacramento Valley）发现金矿，又激起了西进的浪潮。这种哄动全国的淘金热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一件大事，而加利福尼亚州就是策源地之一。由于本地劳动力的缺乏，美国资本家就大量从国外输入劳动力，替他们开矿。

第二，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发现后，黄金流通于美洲及太平洋的亚洲沿岸，扩大了国际贸易和国内工业。就其工业发达来说，在一八四〇年时美国居世界第五位，一八六〇年时居世界第四位。到一八九四年时，已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跃居第一位。工业刺激了商业的发展，美国的商品不断向中国市场倾销。同时中国人民在封建压迫和剥削下，过着穷困悲惨的生活。他们为着生存，有些人积极反抗，参加了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有些人消极反抗，离乡背井，流亡国外，另谋生计。这样一来，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

第三，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的外交政策，并不禁止美国资本家从中国诱致和掠夺劳动力。美国于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与清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八条》，这个条约外人称为《蒲安臣条约》。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本来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派驻中国的代表，后来因为他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得到清朝的信任，特任他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重任的大臣，代表清政府出使美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Seward）签订了这个条约。其中第五款说：“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它的目的是要通过外交程序，以便招工。于是美国资本家以这个条约为护符，明目张胆、千方百计地掠夺中国的劳动力，中国人赴美日多。一八六九年，据旧金山海关统计，入境的华人有一四，九九〇名，据美国移民委员会及移民局的统计，至一八八七年，华人入美总数达到三九，五七九名，三藩市的海关统计则为二六，九〇二名。一八八〇年，华侨在美国人口已达到一〇五，四六五名了。

二、中国工人参加开发美国的劳绩

（一）兴筑铁路

美国东部各老州与太平洋沿岸各新州之间，在横贯大陆的铁路未兴建之前，交通极不方便。船舶往来，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费用高昂。如果取道陆路，就必需越过许多高山大谷和沼泽地带，使旅行者人疲马喘，辛苦万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一种小马快递邮车（Pony Express），用来载运旅客和邮件。还有有篷帐的马车，百十成群，运载物资，长途跋涉，移民叹行路之难。一八六九年横贯大陆的铁路筑成，交通运输问题才算初步解决。〔3〕。

初期所筑的铁路都是短线，如果旅程较远，就要多次换车，有时四百英里路程换车至十一次之多。而每条铁路又属于不同资本集团的公司，由于利益不同，发生很多矛盾。为着加强运输效率，有合并为一条通行东西的干线的必要。在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四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项有关建筑横贯大陆铁路的联邦法律。该路应由两条路线组成，一是从奥马哈（Omaha）向西筑到奥格登（Ogden）的联合太平洋线，由联合太平洋公司承建。

另一条路线为中央太平洋线，从萨克拉门托向东筑去，与前者衔接，由中央太平洋公司承建。联合太平洋公司雇用爱尔兰的移民及退伍军人为筑路工人，而中央太平洋公司则雇用中国工人。

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筑成，是白种工人和中国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他们的努力，两条铁路终于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在普罗蒙特里角（犹他州内）接轨了。在建造中央太平洋铁路过程中，绝大部分工程是由中国工人担任，工作效果极为显著。一八七六年美国国会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加州的华工情况，目的是搜集一些排华的材料。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摩尔吞（Oliver P. Morton），他召集有关的人士进行询问，被询问者为罗先生（Frederick F. Low，前任国会议员，驻华公使，加州第一批落户者）。

问：“在建筑铁路的劳动力中，中国人所占的比例怎样？”

答：“我认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即由加利福尼亚州到奥格登一段，有五分之四的劳动是由中国人担任的。”

问：“他们有无担任开挖沟渠、建筑堤防等工作？”

答：“建筑堤防等工作绝大部分是由中国工人担任的。第一，因为他们劳动力较为低廉。第二，因为所在地是山林瘴气之区，而工作又是会损害健康的。中国人的体质似乎有类于黑人，不受瘴气传染。而英吉利撒克逊种就不是这样。”

问：“如果华人不来这里，白人是否能够立刻担任起这种工程？”

答：“如用白人，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影响工程的进度。”〔4〕

根据上述材料，可见美国资本家也承认华工的工作效果高于白种工人，但是他们把白人不愿干的工作推给中国人，而且又以中国工人担任最下等的工作，压低他们的工资。凡是最辛苦最难堪最不卫生的工作都推给中国人，而轻微的工作都尽量由白人担任。中国工人一般是每月三十元左右工资，还得自己负担食宿费用。白种工人每月工资四十五元到五十元，而且由公司负担他们的食宿费用，即超过中国工人工资一倍以上。据他们所述以及美国学者的记载，中央太平洋铁路雇用华工一万名，白人八百名。这是不正确的。据老华侨说，华工前后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病死、意外而死的）不下万人。美国人的估计和我国人的估计大有出入。他们可能按一个时期来算，而我们是按整个筑路过程中，不论长工短工，凡参加过工作者都计算在内。美国工头自称，招请华工，只注意人数而不注意人名，对于中国工人的更换亦不清楚。至于参加筑路的八百名白种工人也不是足数，或去或留，总不超过八百人。所以兴筑这条二千八百英里的大铁路的繁重工程，主要落在中国工人身上。

铁路建筑的迅速发展，在美国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影响。它促使移民西进；加速钢铁工业的发展，并在多方面加速农业的发展。自铁路建成，盈千累万的人民可以在铁路所布的地方定居，进行开发工作。西部长期荒芜的土地一经开发后，从前每英亩值二元的，这时涨到二十五元至三十元了。

中央太平洋铁路是用中国工人的血汗筑成的。中国工人贡献最大，而受剥削也最深。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筑共花去九千多万元，但根据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估计，应该只花二千二百万元，还有六七千万元究竟落在谁的手上呢？当然入于公司管理人的私囊了。这家铁路公司的资本是一亿二千一百万元，利润达六千三百万元，即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进益

大部分为四大巨头斯坦福 (Stanford)、亨廷顿 (Huntington)、克罗克 (Croker) 和霍普金斯 (Hopkins) 所得。

(二) 开垦荒地

美国利用中国人开垦荒地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我们现在单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首先因为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流居于加州的人数有四八, 七九〇名, 比在美国其他各州的华人为多, 成为开发加州的劳动大军。

加州物产丰富甲于全国, 特别以萨克拉门托河流域的土壤最宜于农业的发展。然而这个流域也是洪水泛滥之区, 所以当地政府和资本家就千方百计利用劳动人民的力量, 来进行驯服河流的水利工作, 与开垦卑湿地同时并举, 使卑湿地免于被淹, 而较高的地方又得到适当的灌溉[5]。

加州面积几乎同法国一样大, 有一五八, 六九三平方英里。可是人口不多, 一八〇〇年西部人口只有三一, 四四三名。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 美国资本家决不会忘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至于在大规模的开垦中, 中国人究竟占什么地位? 请读者参考一些美国官员和资本家的言论便明白了。

关于中国人开垦荒地的情况, 在美国国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召集有关的证人咨询的时候, 一位曾担任加州最高法院助理法官及担任过一垦荒团体——潮湿地垦荒公司 (Tide Land Reclamation Company) 顾问的海登费尔特 (Solomon Heydenfeldt) 当场答复如下:

问: “开垦沼泽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吗?”

答: “是非常危险的。”

问: “用什么劳动力来开发它?”

答: “用中国人的劳动力。”

问: “你不能用人去担任这种工作吗?”

答: “我认为不能, 亦无从去找。这种工作白人不愿意去干的, 白人一般是乐于担任较易于应付而且工资又较多的工作。”

另有一位证人是拥有很多荒地的大地主, 同时又是潮湿地垦荒公司经理的罗拔士 (George D. Roberts), 出席答问。

问: “你的公司拥有多少荒地?”

答: “拥有十二万英亩。最近已开垦了三、四万亩。这些地在萨克拉门托及圣约瑟河的三角洲, 都是河水泛滥之区, 有些地在河的边缘。”

问: “开垦荒地有哪些工作需要人去干?”

答: “拓荒地、筑防堤和开凿沟渠, 以防止河水泛滥。”

问: “你用什么人从事劳动?”

答: “一般用中国人。他们的工作使人极为满意。”

问: “这些地未开垦前是否完全无用? 开垦后价值如何?”

答: “未开垦前的地, 时遭潦水泛滥, 水草丛生, 完全无用。纳价于政府每亩一元。开垦后每亩地价可值二十元到一百元。”

上面两个人的证词是完全有案可稽的。中国人在加州创造出的财富是巨大的, 但却被

美国资本家占有了。布卢克 (Brooks) 曾经在调查委员会前承认：

“我问过一个前任加州总测量工程师，究竟中国人在建筑铁路和开垦荒地两件事中，对加州的财富贡献有多大。他估计是二八九，七〇〇，〇〇〇元，这笔财富是中国人提供于加州的，是完全归白人所有，由白人享受，而不是由中国人享受。中国人不能把这些财富拿走，甚至他们想拿走也不能拿走的。”（前引西华德书，第二章，第三〇至三六页）

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加州志》在提到中国人开发萨克拉门托三角洲地区这件事情时说：“今天位于南部的肥沃三角洲地区，堤堰满布作交叉状，一条条弯曲的泥基为边，捍卫着绿油油、黑喷喷的在水平线下的田地，以防洪水侵袭。在未开垦前，一八五〇年，一些失意的淘金者集居于此，种植糊口。及一八七〇年，中国工人于建造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后，又接受低工资担任开垦三角洲地区的工作。他们推动单轮车筑起堤防。逐渐全部四十二万五千英亩水草丛生的沼泽地被开拓了。由一系列宏伟的堤防、排水渠和抽水机房控制着。今天堤防上许多水闸排水灌水，使无数肥沃黑润的土地受到灌溉。”〔加利福尼亚州工程进度局编《加州志》（California 第五八一页）〕美国有华工劳动力可供利用，而加州就成为美国最富饶的一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人在美国的劳绩是不容埋没的。

（三）采 矿

初期到美国的中国人从事开矿的最多，生活亦最辛苦。有一段反映当时中国矿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文字说：“每人每月的工资大约五、六十元，工头每月百元，这都是开金矿的。此外还有开煤矿的、开银矿的、铜矿的，工钱也差不多。但是这种矿藏，有的在深山当中，需开上几百尺深的井，穿过那熔结、热变、水成的各样石头，方才到底，有时候碰着火险，烈烈轰轰，就性命不保了。有的在大水旁边，要到河底下去摸，连沙带泥的一同挖起来，若是水性不大熟悉的人，勉强多做些时候，只要一点不当心，就不免葬身鱼腹了。唉！总算起来，开矿的华工，死在这种地方的，着实不少。每年替他采出来的金、银、铜、铁、石炭等类，何止亿兆北京钱之数！如落机山 (Mt. Rocky) 西南的里哈司罗金矿，高路仑 (Oakland) 金矿，沙嘎敏多铜矿，阿尔漫腾的大水银矿，落机山东面的尼法达省 (Nevada) 金穴硼砂矿，宜纳 (尼法达省大邑) 金银矿，云丽墨机五金矿，戈阿达 (Dakota) 南金北银矿，拔地尔马田 (译言战山) 银铜矿，用利加银矿 (在坡里雪)，嘎仑银铜矿 (以上尼法达省)，呀耳马煤矿 (在伊尹士顿)，嘎顿 (Ogden) 煤矿，叶骨地煤矿铁矿，华茶治机器煤矿 (以上近盐湖城 (Salt Lake City) 诸矿。其余不是华工开采的并不在内)。这些矿产还不是拿我们华工的性命换来的么？至于拿他的工钱，也寥寥得很。譬如有一个矿，每日出煤二千万吨，每吨值银七元一毫七忽，华工不过分他六毫三忽 (是华工工头廖某讲的)。各矿的工钱大概总差不多的。如此看来，华人何尝辜负美人呢？”（支那自传子：《同胞受虐记》第一章）

一八六二年，加州立法机构组织一个委员会，调查华工在矿区的表现。当时有一位证人克拉克 (Henry K.W. Clark) 指出，华工经常在所谓用坏的矿井里工作，凡白种人不愿去干的工作就强迫中国工人去做，又凡白种工人认为值得干的工作和有出息的矿区就不容许中国人插手。他描写中国工人的劳动情形：“中国工人用铁锹和铲转动大浮砾圆石，开出各方面坑道，抛去泥块和漂砾，把好的土块潜下来。如果在适当季节，他们就将土块投入摇汰台来洗。因为要冲洗，所以经常身体浸在水中，寒冷刺骨；天气炎热，又上炙下

蒸，很不好受。所以工作极为辛苦。”（前引西华德书，第四五至四六页）

中国工人在加州开矿的有二万人以上，他们担当最繁重最危险的工作，替美国资本家创造了无数财富，还受尽资本家、矿场主的种种压迫和剥削。一八五二年五月四日加州当局通过一个法案，凡在金矿或石英矿工作的外国人每月要纳执照税三元。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又增加到四元。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三日解释这个法案说：凡不是美国公民或不声明愿入美国籍者适用此法案。可是所有外国人当中，只有中国人无权声明入美国籍。可见这个条例是专为中国矿工而设。

加州订立这条苛例，不仅剥削华工劳动所得，来增加官府的收入，而且使它的官吏有机会中饱私囊。吉本在其书中引用《内华达日报》的一段话：“这是一种半合法的对华人掠夺的手段。有些税收员是奉公守法的。但更多的税收员滥用他们的地位，向贫而无告的中国人勒索最后的一文。他们把执照上的日期故意填错，格外制造麻烦，来向惊惶万状的中国人追索钱财，并且用其他手段进行舞弊，从而养肥他们自己。受他们迫害和损害的中国人，尽管满腹牢骚，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因为最高法院规定他们在法院无权起诉，而且法院也不理他们的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人的生活是辛苦和饱受压迫的。”（吉本：《美国的华人》（Gibbon: Chinese in America）第二三六页）

（四）农业劳动

自从横贯大陆的铁路筑成后，加州的垦荒工作又迅速进行，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州位于太平洋，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地肥美，植物容易生长，山岭可以植林，河溪可以灌溉。其地宜于种大小麦、玉蜀黍、棉花、甘蔗、黄麻及各种水果。加州土地辽阔，估计可耕之地有一亿零二百万英亩，地价低廉，投资即可以获利。加州的种植园主找不到足够的白种工人的时候，自然不会忘记在劳动市场中找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参加建筑铁路和开垦荒地的中国工人失业后也不得不转入农业和工业劳动中去。在美国资本家心目中，中国工人比白种工人顶事得多，因为中国工人所取的工资较少而工作质量又较高，对他们有利的缘故。

加州盛产葡萄，用来制酒，可供本国及出口之用。一八七五年葡萄的产量已足够酿成八百万加仑的葡萄酒和八万加仑的白兰地酒。产酒的数量多于法国、德国及西班牙产量的总和。需要劳动力之多，可想而知。即以松蒙马郡（Somoma County）的葡萄种植区来说，经常雇用五百个中国人，主要担任种葡萄和摘葡萄的工作。

加州中部和北部盛产水果，输出国外以橙子为大宗。由于种果树本少利大，所以园艺事业日益发展，需要劳动力亦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旧金山就有二千五百华人被雇用来说来种植葡萄，有二千二百华人摘果和装罐头。中国农艺工人，多数懂得农业技术，也有不少人种植果树技术，特别是接枝等高级技术，有时还从中国带来一些植物种子，推广种植，例如广东人陈芳就曾把广东名产荔枝移植到檀香山。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辛勤劳动，对于美国财富的增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一定贡献的。

（五）工业与服务行业的劳动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西部的机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加州以轻工业为主，有羊毛纺织品、麻袋、绳业、木箱、家具、蜡烛、服装、扫帚和火药等。其中首屈一指的工业是羊毛纺织，容纳华工过千。其次是麻织，也雇用中国人为多。例如太平洋麻织厂（Pac-

ific Jute Factory)里,白人不过三四十名,而中国人有二百二十名,其他工厂亦华工多于白种工人。在旧金山,中国工人从事制造靴鞋的有一千五百到二千人,制造拖鞋的有一千多人;制造帽子的有二百人以上,制造雪茄烟的有三千三百人,制造服装的有一千多人,这都是一八七六年的统计。其他如玻璃厂、橡胶厂和制革厂都有不少中国人在里面工作。

此外,美国的有钱人家普遍雇用中国人在家庭服务,特别是从事厨房工作。一八七六年估计,旧金山的家庭的中国佣工有五、六千人,如果全州合计,可达一万五千人。中国人从事洗衣工作亦有三千六百人以上。洗衣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他们每日清晨六时即开始工作,深夜一、二时才收工,长年累月,疲倦不堪。一方面自食其力,另一方面为群众服务,可是加州当局还要剥削他们。一八七三年五月加州议例局立一苛例:“凡洗衣馆或洗衣馆事务处所雇用之男子及其东主司事经纪等以及凡与此业有关涉之人,每人每季须抽例银一十五元。”又另定一条:“凡洗衣馆及洗衣馆事务处非用牲口牵车者,每月须纳银十五元,余一照前时之例。”按美国人洗衣店资本充足,生意浩大;皆用马车收送衣物,每季亦仅抽规银三元,华人洗衣店资本微薄,生意细小,俱用竹箩挑送,却反令纳银五倍于美国人,可见此例专为剥削华侨而设(伍盘照辑,陈振先译:《非禁说》,第五七页。十年之后,无理措施变本加厉。加州中国人开设的洗衣馆八、九百家,多数木屋,兼有晒棚,当局以防火为借口,勒令改建瓦楼铁门,拆除竹木的晒棚,不从者任意拿人罚款,使中国洗衣业者遭受极大的骚扰和损失。

三、美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与排华运动

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美国正在大力开发西部,需要劳动力大为迫切,特别自加州金矿发现之后,更积极吸收外来劳动力。外国劳工移入美国的人数逐年增加。一八四〇年到一八五〇年,移民到美国的人数是一,七一三,二五一人;而在一八五〇到一八六〇年期中却增到二,五九八,二一四人,其中中国人有三四,九三三名。中国人的来临,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赴美除极少数人靠亲友代筹旅费外,多数人的旅费是由招工的经纪人先垫付,到美国找到工作后,加上利息按月陆续扣还。利息是很高的,大约借四十元,还时为一百元或多些。只有清还欠债,才算是一个自由的劳动者。从他们遭遇来说,比“契约工”或“猪仔”似乎好一些,但从性质来说,也很难说截然不同。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鸦片战争后,美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招工所”,或通过美国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洋行,派出所谓经纪,采用利诱强迫,或拐骗掠夺的方式,网罗壮年男子,称为买“猪仔”,美其名为“契约工人”,乘美国商船赴美。据有关记载,在一八五二年与一八五八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到汕头港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四万〔6〕其实“苦力贸易”的港口不止汕头,还有黄埔、厦门、香港、澳门、上海等埠。到一八六〇年,这种苦力运输已被美国飞剪号所垄断了。被拐骗来的华工上船后,生杀之权操在经纪人手中,他们往往与外国船主串通,把华工关在舱底,环境污秽,空气混浊,饥饿难忍,疾病蔓延,受尽折磨,死亡相继。一八五四年十一月间发生开往金山的《里伯达号》所搭

之客，死去甚众之事（一八五四年十一月《遐邇贯珍》第十一号，《近日杂谈》）。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残酷压迫之下，往往奋起英勇反抗。一八五七年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指出：“连那些到外国去的苦力（指华工——者注），也好像在事先约定了的那样在每一只移民船上起来反抗，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身一起沉到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而不愿降服。”一八五一年和一八五八年都曾在装载华工的美国船上，发生华工反抗压迫，在海上放火烧船与强盗们同归于尽的壮烈事迹（详见严中平：《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天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十九世纪的洋务专家容闳自述其见闻说：“华工被诱后，既悟受人之愚，复受虐待之苦，不胜其愤，辄于船至大洋，四无涯际时，群起暴动以反抗，力即不足，宁全体投海以自尽，设或竟以人多而取胜，则尽杀贩猪仔之人及船主水手等，一一投尸海中以泄怒。纵船无把舵之人，亦不复顾，听天由命，任其飘流。”（《西学东渐记》，第一一四页）

在美国的华工的处境，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越来越困难了，排华之风也越来越盛了。排华运动的发生是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结果。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美国正处于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自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间，美国工业生产的总值差不多增加了四倍。一八六〇到一八七〇年间美国工业机构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八，生产总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工厂工人的数目也从一，三一，〇〇〇增加到二，〇五四，〇〇〇名。大量的公共土地转移到那些以铁路及采矿等方式进行剥削的，以投机为目的的公司手中，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最卑鄙下流的金融寡头集团。从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方式的集中经营看来，由自由竞争制发展到垄断公司制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资本家和资本集团的互相兼并更为剧烈，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更为残酷，施于外国移入美国的工人身上的压迫自然比施于本国工人身上更为严重。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是最快的，就连续出现好几次的经济危机：一八五四年、一八五七年、一八六〇年和一八七三年，都是经济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美国资本家和垄断资本集团一方面企图把经济危机转嫁于人民群众身上，另一方面，企图把本国被剥削阶级，特别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转嫁到入境的移民身上，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外国移民，为着生活，就被资本家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使用。当本地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时候，资本家就利用外来的工人来代替他们，并乘机煽动本地工人对外来工人的不满。

美国资产阶级还利用反动组织和报刊进行反动宣传，把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归咎于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说什么美国工人是不能和那些外国人竞争的，外来工人吃的是最恶劣的饮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这些人不配与美国劳动者和美国技工为伍等等。

一部分外来的白种工人，如爱尔兰人及德国人等，由于组织工会团结斗争的结果，终于能够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与美国工人一道，进行劳工运动，有些人还入了美国籍。而中国人没有权利加入美国籍，再加上种族不同，语言不通，组织力薄弱，祖国不强，无法参加白种人的工会，资本家更毫无忌憚地压迫他们。由于中国人被看作有色人种，资本家更

“容易散播些种族偏见，施行种族压迫。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美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种族歧视，实质上是阶级压迫。”

当时美国工人对中国工人的态度有两派。一派是进步的，即认为反对中国工人就是分裂工人阶级，只会对雇主有利。美国工人不但不应该跟着喊“黄色威胁”，而必须组织中国工人以防止老板们利用他们来减低工资标准。而另一派则是反动的，而且是最有势力的，包括被收买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以及一些带有种族主义的观点的工人。他们认为中国劳工在美国是“一个大灾害，它将产生贫困及随之而来的苦难与罪恶，因之必须予以禁止。”美国劳工党在机会主义者把持下，甚至发动要求政府废除一八六八年签订的中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蒲安臣条约，而另订禁止华工入境的条约。

有一个爱尔兰工人丹尼斯·几尔尼（Dannis Kearney），本来是个投机商人，一度要求加入美国劳工党，但该党认为他一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加以拒绝。一八七七年八月，他纠集一些落后工人，组织旧金山各行业工人劳动协会，几个月后又建立了加利福尼亚工人党，自封为主席。他对华人发泄种族主义的仇恨，叫嚷“我们建议以最大的速度并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全部消除国内廉价的中國劳动力，因为它较其他的一切更为严重地危害着劳工地位，并增加了资方的力量。”几尔尼的党到处拉拢和威胁工人参加，提出“中国人必须回去！”的口号，利用工人对失业的恐慌，煽动他们排斥华人，转移他们对资本家的仇视。一时参加这个党的工人很多。甚至其中还有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的成员（当然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各地建立区分部，每星期日晚上都在沙滩上集会，所以又称为“沙滩党”（Sandlot⁵）。而几尔尼终日带领一批打手，敲詐和迫害中国人。凡反对他的工人都受到他的打击。

这个以排华起家的工人贵族受到一些有正义感的工人的反对。东部有一位工人领袖卡列勃·狄雷曾经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工人党批评他说：“很多人之所以变成无业游民，并不是由于有中国人的缘故，而是由于有一个更有力的敌人存在，那就是那个没有心肝、没有灵魂、永远也不会听见你们死前的呻吟的敌人——资本。”工人党内大多数人指斥几尔尼的独裁和背叛行为，而争权夺利也促使加利福尼亚工人党本身趋于分裂。几尔尼的反动面目终于被揭露，他本人也被抛弃了，同时工人党也逐渐衰落下去（参看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中译本，第一卷，第七一六至七二三页）。

同时，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在机会主义者把持期间，对中国工人问题也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劳工骑士会成立于—八六九年，最初入会限于服装工人，以后逐渐扩大为一般工人的组织。初时它在工人运动中也做出过一些成绩，可是到—八八一年就被机会主义者引入歧途了。—八八一年泡德利（Powderly Terence Vincent）被选为会长，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甚至背叛—八八六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泡德利出任总会长不久，就规定亚洲人不能成劳工骑士会的会员。他甚至认为亚洲人不适宜于在美国居住。劳工骑士会的发言人在美国国会里发表了这种反动的沙文主义的观点。他们极力主张把中国人逐出美国。劳工骑士会的领导人竟夸耀说：在促使通过—八八二年排华法案上，劳工骑士会曾经起了重大的作用。

泡德利在—八八五年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提到怀俄明州石泉地方会员对中国人的屠杀事件，虽然承认“这一残忍和屠杀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但是他接着却责难中国人

和那些愿意雇用他们的人，说什么“白种工人为中国人在规避禁令方面得到成功所激怒，他们怒不可遏，因而向中国人进行了可怕的报复。”这样，泡德利和劳工骑士会的上层分子不仅没有谴责恐怖主义者，反而攻击中国工人，好像只因中国工人激怒了白种工人才遭到屠杀。但石泉事件却激起了另一部分劳工骑士会会员的愤怒，各地纷纷起来谴责屠杀及其包庇者，越来越多人抗议虐待中国人的政策。有一些站在正确立场的会员指出“这个组织的根本原则是清除所有信仰、肤色、国籍的界限”，并且认为解决雇主利用中国人来削减其他工人的工资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当中国人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对美国的劳工运动作出有价值的贡献。纽约第四十九区工会领导人提美西·奎恩在纽约组织了两批中国工人，并且努力替他们申请作为正式分会会员，但由于全国总执行委员会的反对而没有发给会员证书。劳工骑士会领导者的沙文主义，使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工运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参看方纳前引书，第二卷，第六五至六八页）。

美国资产阶级为着掀起各地排华浪潮，就利用一些政客、流氓、工人贵族和反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实行人身攻击，制造无数的谣言谤语，来污蔑中国侨民，目的在于为他们的排华暴行找寻借口。排华的论调，强词夺理，不堪一驳，不过把它罗列出来，加以分析，以可窥见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的愚昧程度和野蛮手段。

排华论者把中国人诋为道德败坏的民族，有嫖有赌又有吸鸦片的。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其实卖淫制度早已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十九世纪卖淫变为商务的特别部门，加州的卖淫事业早已发展于中国人到来之前，娼妓遍布城市，政府亦不禁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至于赌博这种恶习，在美国极为普遍。中国人每天从事十多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哪有许多时间来赌博？好赌之徒在华侨中只占极少数。

至于有的中国人染有吸食鸦片的坏习惯，那首先应该谴责贩运鸦片到中国的英美强盗。美国境内竟然容许鸦片的运入和销售，也应该由美国当局负责。科尔顿（Colton）曾在美国国会调查团面前作证说：“我没有一次能够找出他们（中国工人）的过错。他们完成任务迅速而忠实，我以为你可以相信他们是一个有智慧有思想的民族，他们不是轻浮暴躁的人，而是稳健、坚毅、勤俭的人。我一生没有见过酗酒的中国人，我听说过他们是抽鸦片的。但三、四千名筑路的中国工人没有一个吸鸦片。他们没有使我麻烦过，他们一早就上班，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我们雇用的工人中，他们无疑是最纯洁的。”（前引西华德书，第二一二页）

排华论者攻击中国人永不同化于美国人，不采用美国的生活方式，对美国毫无利益。如加州议会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斯威夫特（John F. Swift）说：“他们（中国人）是不能同化的，一代二代及以后各代都不能同化于我们，仍然是愚昧的外族，不止今天在美国的华人是这样，一百年或五百年后都仍然是无教育的中国人阶层。”（同上，第二五〇页）。这种对中国侨民的攻击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俗习惯，不能强人就己。中国人在美国生活水平不能提高，完全是美国资本家剥削所致。美国当局执行许多排华措施，极力阻止中国人入籍，千方百计来迫害中国侨民。他们不愿中国人入美国籍，反而责备中国人不受同化，其目的不外是借此宣传种族主义的反动观点，作为排华的借口而已。

排华论者又说，中国人口繁殖率高，工资低，生活苦，一有机会自然涌入美国，其趋势会使美国成为中国的省份，使美国成为蒙古化（Mongolianized）。这种攻击，显然是没有理由的，况且，美国的人口来源极为复杂，多数来自欧洲各国。今举下列移入加州的人口统计数字说明：

	1850年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白 人	91,635	323,177	499,424	900,000
有色人种	962	21,884	11,513	11,510
中 国 人		34,933	49,310	75,000
合 计	92,597	379,994	560,247	986,513

假定上面的统计数字是对的，那么中国人与其他人种的人口比例是：一八六〇年十一个移民中约有一名华人；一八七〇年十一个移民中约有一名华人；一八八〇年十三个人中约有一名华人。我们又以白种人和中国人移入加州的数字比较来说，一八七〇年白人移入加州超过中国人有十倍以上，一八八〇年白种人又超过中国人十二倍。加州移民局的统计已经把“蒙古化”的谬说自行戳穿了。

至于攻击美国华侨无益于美国，企图抹煞在美的中国人对美国开发的贡献，更不值一哂。如果没有中国人兴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可以说没有加州今日的繁盛。又有攻击中国人赚了美国人的钱就汇回中国去，而不用在美国的，亦似是而非之说。查一八六二年加州立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加州的中国人有四八，三九一人，其中约有三万人从事开矿，估计他们一年的总收入约为一千五百万元，但用以交纳各税项（如人头税、矿工税及产业税等）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费用达到一千四百万元，即他们收入的总数只有百分之十归其自己自由支配，其他部分都在当地消费。中国工人节衣缩食积蓄来的钱是要养活本人及汇钱回国赡养家庭的。他们储蓄下来的钱是用血汗挣来的，他们自己完全有权支配。

排华论者为着煽动群众反华，竟诬中国人在加州建立政府，不受美国的法律制裁。例如普息斯利（Pixley）在国会调查团面前大放厥辞，说什么“我毫不怀疑我能够证明华人设立秘密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之权，是‘国家内之国家’（imperium in imperio），他们设立私刑，甚至强制支配人们的生命财产。我想我能指出，他们平常秘密行事，用钱来征求别人暗杀密告者和敌人，而他们组织得这样秘密、狡猾和严密，来对抗侦探部的追查或法庭的调查。”（前引西华德书，第二二三至二二四页）普息斯利所指华人在加州私设法庭是没有真凭实据的。私设法庭必有名称和地点，而法庭必须有执行的集团，他都说不出来的，可见完全是捏造。

他们找不到证据，就攻击到华人自己组织的六大会馆，说这些会馆是包办契约劳动和具有独立权力的机关。关于六大会馆的当时情况，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赴美参观在美国举行的各国展览会的李圭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美国卡厘方利亚省之三藩谢司戈城，华人以其他产金，称为金山，嗣南洋澳大利亚

島亦产金，称金山，而以新旧别之，称此为旧金山，美西海湾一大都会也。计华人在美男女约十六万人名口，居三藩城者约四万人，居卡省别城者约十万人，余皆散处腹地，各属三藩城，立有粵人六大会馆：计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德、附三水、清远、花县）约一万一千人；阳和会馆（香山、东莞、增城、附博罗）约一万二千人；冈州会馆（新会、附鹤山、四会）约一万五千人；宁阳会馆（新宁、凡余姓人不入）约七万五千人；合和会馆（新宁余姓，开小、恩平）约三万五千人；人和会馆（新安、归善、嘉应州）约四千人。其不入会馆者，别省人及教徒优伶共约二千人，妇女约六千人。……至咸丰元、二年，连引日多，始将三邑、阳和、四邑（新会、新宁、恩平、开平）三会馆。三年分四邑之新宁为宁阳，分阳和之新安为人和。同治元年新宁余姓复合四邑之恩平、开平为合和，四邑之名旋改为冈州，即今之六会馆也。各公举贤能者为董事……一年一易，称职者频年任之。其章程大槩，以华人到埠时各馆派人赴码头接引至馆，签名挂号不取资，俟其人得资回国时，报明会馆，查无欠债等事，由馆代购船票后，终酌取会馆经费，洋钱五元或十元不等。若年老贫病而归者不取资，且代捐船费。其不愿入馆者听，然亦甚少。所收经费，用为房租薪水工食，倘有余存，留办善事。遇乡人口角争斗，细小事情，由馆力为劝解，使各相安。是六馆所经理者仅此数端，既无名位，经费又绌，诚不能有所为，故其余一切悉归地方官管辖焉。”（李圭（小池）：《环游地球新录》第三，《环览随笔》，《书华人寄居美国始末情形》，第二八至二九页）

关于六会馆的性质、沿革及其职能，上文已经说得颇为具体，至于各会馆成立之先后，亦有可补充的：“首先是冈州会馆，次为三邑会馆，再次为四邑会馆，均是于一八五一年成立者。至一八五二年继有阳和会馆和人和会馆组织。一八五四年成立宁阳会馆，一八六二年合和会馆成立，于是有六会馆，合称为中华总会馆。”（陈汝南编：《美国华侨年鉴》，第三六二页。谨案：上文举出七个会馆。但一八六二年冈州会签与四邑会馆合并，故似为六会馆）。六大会馆是我旧社会的同乡会馆，董事由华侨公推，没有政治活动，受地方官管辖。美国人称它为六大公司（six companies），任其存在。它纯粹是华侨团体的组织，目的在于互相帮助，特别是在法律及道德范围内的互相帮助。

吉本对华人六大会馆调查研究后，提出比较客观的意见说：“有些群众对于六大会馆及其权力有很大的误解。中国人的习惯，当大批人由一个城市移居在另一个城市，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组织一个互助的社团，一个行会。它的职员是公选的，在一定期限内行使职务。它的经费是自动献的，例如要建立一个会议堂，他们就自动捐助建筑费，一般会议堂的旁边，往往建立本族的宗祠。会议堂就是这个团体的集会地点。参加会馆的人，如有争端及彼此分歧的意见，一般是由职员和有威信的会员代为调解，不必先去见司法长官。会员是一律自愿参加，亦可以自由退出。加州有几个这样性质的华人团体称为六大会馆。每个会馆是由中国某一地区的同籍人组成，并代表他们。入会没有正式的仪式或礼节，没有入会费，也不发会员证。这几个会馆的执事人，当轮船到港，就立刻查明来美的华人的名字、年岁和籍贯，知道了他的名字后，就立刻载入会馆的名册，表明他们从何府何县来的，以便联系。这些会馆在加州开发的初期作用更大，因为它对新来的华人加以指导，对于贫而无告者及病人加以适当照顾，又多做好事，如把死者的骸骨运回故乡安葬。但现在来美的人多有亲友协助，贫病之人亦有亲友照顾，死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往往葬在美国，

而不一定运回中国去。这种风气已经逐渐形成了。”“中国人之间的争端和分歧的意见提到会馆的执事来调解和仲裁都是由两造人自由选择的。会馆对华人没有也不企图用任何民法或刑法的裁判。实际上，会馆的劝告和调解常常不被两造人所接受，会馆排解无效后又上诉于美国法庭。”（西华德：前引书，第二二八至二三〇页）

加州议会的调查委员会又曾召集六大会馆的负责人查询。他们声称会馆的人员包括董事、稽核及厨工，而经费由各华人商店乐捐。董事是选举的，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商人也就是会馆的成员，但会员也有不是商人的。董事月薪八十元，其职务正如上述是协助新来的言语不通的华人，并照顾有病及失去工作能力的华人等等。

上面的材料证明，六大会馆的性质根本是社会福利的组织或互助会之类，而且采取民主方式选举董事，经费自由乐捐，排难解纷，奉公守法，没有任何秘密行为，对于美国的社会秩序有协助维持的作用。排华论者有意制造谣言，把六大会馆说成是不受美国法律管辖的秘密组织，或自治政府，“国中之国”，无非是煽起政府当局和一部分群众对中国人的仇恨，达到他们排华的卑鄙目的。

在各地排华分子煽动下，迫害华侨事件不断发生，这些迫害事件以全体华侨为对象，不限于中国工人了。现在我举几个例子。

一八八五年九月二日怀俄明州（Wyoming）石泉（Rock Spring）矿区的华人住宅，被一群白人突然袭击，劫掠、破坏、焚烧，有华人二十八人被杀，十五人受重伤，财产损失约值美金十五万元。（参看王咏霓：《西斋日记》，第三二页。达勒斯：《中国和美国》（Dulles, China and America）第八九页）

又有全埠驱逐华人，乘机抢掠焚烧的事。一八八五年钦巴埠数百华人被迫迁往砰老埠，其状极惨，详情如下：“……不意而十一月三号竟有洋人官居雪地咩者，倡率匪党八九百人手持火枪，勒令埠内华人即日离埠。其华人中之开铺店者，每铺限留两人搬运货物，至迟限搬至是月六号四点钟为止，如至期仍未将店内货物搬尽，即行焚烧等语。该匪党又于是日（即十一月三号之日）先用火车来至埠上，称载华人往砰老埠，自寻栖身，不用车费，此时华人无论男女，迫于凶焰，各顾性命，或仓皇奔至车上，或被匪党捉曳登车，凡华人所携衣物银钱，多被匪党乘势抢掠，如虎驱羊，任其所为。迨火车仅离钦巴埠八哩（按今译疑为哩——引者）路左右，匪党即威迫华人全数下车，此时已是傍晚五点钟时候。各人落得车时，又值大雨，衣衫尽湿，饥寒交迫，哭声震野，而匪徒仍用五、六十人骑马持枪，押令华人立刻步行，不许反顾，行稍迟者，鞭撻从事。其中身有疾病者，亦不许暂息，苦更难言。迨至步行已远，该骑马匪党始行回去，不复驱押。但其地系在半途，距砰老埠当有百哩左右，而又未息，四野迷冥，困踣路旁。其中华人，或身上带有银两者，值火车经过，尚可附搭过埠，其银两全无者，约百余人，只得困伏路隅而已，及至砰老埠华人闻知，始捐资急请火车公司在于半途装载此等华人，出至砰老埠。及至是月五号得钦巴埠电信，又谓该处华店之货物未搬者被火焚八九。”〔7〕

一八八七年四月有白人四名携来福枪在阿利近省北方之士匿河岸谋杀华人三十四名，劫去银六万元。所有凶手四人俱得逍遥法外。及后四人中有一人临死时自认此事，并谓当日所为系极其残忍云（参看《非禁说》，第五二页）。

石泉屠杀案发生后，加州立法委员会竟认为排华是势不能免的。它发表声明说：“中

国把它的垃圾倾到于我们沿岸三十年了。一切无能的、愚昧的、不幸的人，罪人和病者，道德败坏者依然和我们在一起。这些男人是世界上最贱的奴隶，这些妇女是奴隶卖淫者……这些儿童是世界上最乱七八糟的杂种。”（达勒斯：《中国和美国》，第九〇页）美国资产阶级用这样无耻的谎言，下流的口吻，企图掀起排华的浪潮，以达到民族压迫也是阶级压迫的目的。由此更可以看出，排华运动确是美国当局纵容的。

一八七六年美国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加州调查华工情况，以参议员莫顿（Oliver Morton）为主席，结果根据一些攻击华人的材料编成一本指责华人的报告。委员们对中国入成见极深，而且又秉承资产阶级的意旨，就主张限制华人入口。当时我国派往美国办外交的容闳说：“当时有上议院议员名白伦（Blaine）者最为兴高采烈，首先倡议反对华人。推白伦之心理，亦非与华人有深仇夙恨，不过其时脑中有愿作总统之妄想，遂假此题目以博誉于工党，冀得太平洋沿岸一带之选举票也。自有此议以来，美人种族之见日深，仇视华人之心亦日盛。”（《西学东渐记》，第十八章）

一八七九年美国国会根据一八七六年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通过一条法案，限制华人进入加州，每船不得超过十五人。当时的总统海斯（Hayes）恐怕在中国的美人受到报复，暂不批准，另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要求修改一八六八年的条约。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双方签订中美条约四款。但美国代表利用清朝外交官媚外的心理和对于英文的隔膜，在条约上施用欺骗手段，在关键问题上使约文有利于己。因此中英文本文字上大有出入。例如第一款中文作：“大清国准大美国可以或为整理或定人数之限，并非禁止前往。”而英文本则作“（对于华工之入口及居留）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可以整理、限制或暂时停止他们前来或居留，但不可绝对禁止。”（……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regulate, limit or suspend such coming or residence, but may not absolutely prohibit it.）中文本无“暂时停止”（suspend）字样，显然是美国代表私添。中文本只有作“并非禁止前往”，而英文本私加“暂时停止”字样，用“替时停止”的字眼来代替“禁止”，其实“暂时停止”与禁止并无多大区别，因为没有说明究竟停止到什么时候。既然用了“暂时停止”字样，而且又是等于禁止的一种办法，所以又用“但不可绝对禁止”等字，比中文本多出“绝对”（absolutely）一词，这就是说，禁止还是要禁止的，不过并非绝对而已。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一切排华政策，把这个条约有利于己的条款充分利用，而不合于自己利益的就任意推翻，或者简直置之不理。

一八八二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暂停华工入美，为期二十年，后改为十年。

由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五年间，美国联邦和各州当局订立了许多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国人入口。每一年中，不是重申旧例，就是设立新例。中国人在美国不断受到迫害。相反地，美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还受到清政府的保护。一八八八年美国总统克利夫兰（Cleveland）要求与清政府签订以二十年为期限禁止华工前往美国的条约。清政府亦知美国欺压华侨，但终于批准此约。

清政府对于美国虐待华侨的种种措施，迫于民愤，也曾不断提出抗议，但美国政府利用中国处境困难，对于中国提出的抗议只答应“慎重考虑”，其实是置之不理。一八九二年及一八九三年，美国国会又将禁止华侨入境的限期，一而再地延长了十年，而排华法案